

忘却与纪念

鲁迅研究六十年

(1959—2015)

唐弢 / 等著





忘却与纪念

鲁迅研究六十年

(1959—2015)

唐弢 /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忘却与纪念:鲁迅研究六十年:1959~2015/唐
弢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学术月刊丛书)

ISBN 978-7-208-14117-9

I. ①忘… II. ①唐…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1074 号

责任编辑 鲍 静

特约编辑 张 曦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 学术月刊丛书 •

忘却与纪念

——鲁迅研究六十年(1959—2015)

唐 弢 等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417,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117-9/I · 1590

定价 68.00 元

前 言

201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暨诞辰135周年,2017年则是《学术月刊》创刊60周年,又逢《野草》问世90周年。《学术月刊》与鲁迅研究联系密切,在60年(中因“文革”停刊十年)办刊史中刊登了46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这对于一个每期仅发表寥寥一两篇文学研究文章的综合性杂志而言,数量不可谓不惊人,但在浩如烟海的鲁研界,这点数量又算不了什么。“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鲁迅研究贯穿了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始终,这是鲁迅本身的丰富和深刻所决定的。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编选一本鲁迅研究文集,既是寄托对鲁迅先生的纪念,亦是《学术月刊》对自身的一次检视与收藏。

鲁迅是始终处于现代文学风口浪尖的伟大人物,由此,鲁迅研究一直受到时代政治文化诸种因素的塑造和冲击,也就不难理解。学术期刊的有趣之处便是忠实显示了这种时代印记。但这次编选,我们还是尽量消除时代偏见,而保留那些既有鲜明时代意识又能推动鲁迅研究实际进步的偏于学术性的文章,如唐弢《五四时期的鲁迅——鲁迅杂文所反映的五四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丁景唐《鲁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一些文献资料》、沈鹏年《关于鲁迅在辛亥时期几个史实的辩正》、文操(方行)《1922年〈鲁迅日记〉拾辑》等。可以看出来,鲁迅与时代、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的道路,鲁迅的社会活动,鲁迅著作文本的考释,这些鲁迅研究的主要方面,即使在运动不断、斗争频仍的年代,也仍然能够保持基本平稳的规模。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此前的“现代”时期鲁迅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顽强延续,以及当时一

些前辈学者可贵的专业精神。但我们采取这种编法,其实也有违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尽量保留对手文字以显示时代氛围的用心,只是考虑到如今也并非毫无接触过去时代丰富文献的渠道,所以我们的“割爱”大概也还不会导致太大的“遗珠”之恨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鲁迅研究迎来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从许杰《重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开始,我们选入了丁景唐、刘再复、吴中杰、白振奎、蒋凡、汪晖、陈福康、陈鸣树、姚锡佩等鲁迅研究大家的代表文章。这些文章从鲁迅的家学、古文字学、民族性观念、文艺思想发展、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和文化心理结构、重要作品的重新解读等各个方面,显示了“新时期”鲁迅研究新局面的开创。

进入21世纪,鲁迅研究显示出多姿多样的局面。走向深化和细化,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向,而一批更具当代视野的研究者也为本刊的鲁迅研究带来新气象。对于鲁迅著作整体性的解读,鲁迅对传统文化强悍精神内涵的呼吁,在东亚历史中重估鲁迅传统,鲁迅接受外来影响所体现的对话性质,以及更多的细读、别解……比如杨义、孙郁、郅元宝、赵京华、宋剑华、张钊贻等作者所显示的问题意识与新的研究模式,无不体现了鲁迅在纪念章太炎先生时所期许的“让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那种精神。一批更年轻的作者如曹清华、陈力君、黄江苏等,则更加显示了鲁迅研究的多种可能与活力。

《学术月刊》不是鲁迅研究的专业性杂志。但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次选编优中择优,以年代顺序编排,希望能够留下几代鲁迅研究者的足迹,显示过去数十年鲁迅研究或一方面的成绩,给未来者们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目 录 | Contents

- 1 / 五四时期的鲁迅
——鲁迅杂文所反映的五四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
唐 弢
- 13 / 鲁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一些文献资料
——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 丁景唐
- 29 / 关于鲁迅在辛亥时期几个史实的辨正 沈鹏年
- 45 / 1922年《鲁迅日记》拾辑 文 操
- 57 / 鲁迅历史观的发展 李文海
- 73 / 重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许 杰
- 80 / 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 刘再复
- 93 / 《诗韵释音》和鲁迅的家学
——兼考周介孚的两次训示 姚锡佩
- 96 / 鲁迅与古文字学 陈福康

- 104 / 文学“民族性”的二元性与流动性
——关于鲁迅民族性观念的思考 刘再复
- 114 / 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 吴中杰
- 126 / 谈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子夜〉和国货年》
丁景唐 王保林
- 134 / 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陈鸣树
- 149 / 论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
——对五四以来知识者心理模式的分析 汪 晖
- 165 / 现当代散文诗与鲁迅文学传统 张彦加
- 179 / 鲁迅、胡适早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方法论比较研究
白振奎 蒋 凡
- 192 / 《野草》别解 郜元宝
- 211 /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鲁迅文学的发生 任 珊
- 229 / 论鲁迅著作的整体性 郜元宝
- 241 / 狂人的“病愈”与鲁迅的“绝望”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与文本释义 宋剑华
- 253 / 表达与鲁迅的“思想”
——一个世纪难题 曹清华

- 268 / 论鲁迅《野草》的词语悖反、母题悖论及其艺术张力
杨剑龙 陈卫炉
- 284 / 师者与他者
——鲁迅笔下日本形象之镜观 陈力君
- 296 / 鲁迅的经典意义与中国形象问题 陈国恩
- 301 / 启蒙者与文学者：鲁迅研究的不同关注点
——由竹内好的《鲁迅》说起 黄江苏
- 317 / 不能忘却的纪念(笔谈) 郜元宝 孙 郁 刘绪源
张钊贻
- 345 / 遥祭汉唐魄力
——鲁迅与汉石画像 杨 义
- 400 / 对话中的鲁迅 孙 郁
- 411 / 在东亚历史剧变中重估鲁迅传统
——关于鲁迅对“东亚”的淡漠与他在战后该地区影响力的考察 赵京华

五四时期的鲁迅

——鲁迅杂文所反映的五四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

唐 弢

五四运动是鲁迅生命历程中一个划时代的开始。这不仅因为：他的作为“新文学开山”、“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小说，开始发表于这一时期；不仅因为：他的“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后来成为战斗的主要武器的杂文，开始发表于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鲁迅当时的所有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渗透了深入于历史内容的这一时代的精神，他猛烈地反击帝国主义，对封建主义进行持久不懈的斗争，坚韧，深沉，泼刺，恰如他自己所说，“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他的主张打落水狗、主张师法天津码头上“青皮”索钱的手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也是为了对付一切反动势力而提出的。这些都充分地说明鲁迅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为中国革命彻底扫除障碍的满腔热情。如果说，五四运动重新唤起了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前那种勇迈直前的战斗“豪情”，那么，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以他丰富的经验，和他的战友们——那些具有初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一道，在反帝反封建的战线上，为五四运动注入了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性与不妥协性。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的五四运动的这一杰出的历史意义，在鲁迅的文学事业，特别是他当时所写的杂文中，有着无可置辩的生动而突出的反映。

鲁迅的步伐,其所以能够和五四的整个步伐达到如此一致的地步,一方面,是由于他自觉地“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像上一代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比较长期的奋斗和探索,懂得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恶毒,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斗争中培育出不屈不挠的“硬骨头”,永远抱着那颗与敌人抗争到底的顽强的决心。

鲁迅所经历的是一个艰苦的、然而令人鼓舞的历程。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毛泽东)鲁迅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且是被派往日本的许多留学生中间的一个。当他还在东京的时候,为了探求民族进步与人民解放的道路,“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的确“什么书也看”,他不断地找寻真理,为祖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他对辛亥革命曾经有过热烈的期待,并且积极地投入这一斗争。可是幻想马上破灭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在经济上既没有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没有彻底地粉碎军阀官僚集团及其所代表的封建思想体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甚至一直到了后来,依然使鲁迅有久矣乎“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感觉:“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里流露出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极度的失望,而且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积极筹备帝制,封建大龙座再一次压向中国人民的头上,许多沉滓又随着浮了起来,当初“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皇皇然若丧家之狗”的绅士老爷们,“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此后是七省独立,张勋复辟,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形成段祺瑞依靠外债——特别是向日本借债来维持其封建统治的局面。从辛亥革命一直到这个时期,鲁迅完全陷入于苦闷的沉思里,他所得到的的是一个这样的结论:“反改革者对于

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换些态度和方法的。”他一方面深切地体会到封建势力的顽固残酷,帝国主义的狡诈险恶,此后倘求改革,必须把这一切连根铲除,加强了他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必须战斗到底的认识;另一方面,鲁迅虽然抱憾于革命的不彻底,对资产阶级的软弱现象表示不满,却还不能够根据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只是笼统地认为改革者“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势必使“混沌状态”“无穷无尽”地延续着。由于鲁迅思想上的这个根本问题,在当时——并且也在此后一段较长时期里没有解决,早年所抱的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科学、因而必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观念,也就无从改变。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实行的失败,归结到所谓“国民性”问题。“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反而会把“愤火”发泄到“比他们更弱的人民”的身上,纵然有人挺身而出,这种“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由于鲁迅当时接触的多半是市民阶层的人物,市侩主义的奴才哲学,以及一部分落后群众的保守状态,在改革者心底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感,竟使鲁迅把这些概括成所谓“国民性”问题,这当然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然而鲁迅并没有气馁,作为战斗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探求民族进步和人民解放的愿望,一开始就堵绝了思想上的退路,逼着他采取进取的态度去“直面人生”,所以他终于又说:“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怎样改革呢?鲁迅的劝告是抛弃“华夏传统”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却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结果便出现——或者说更加强了他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观点。

怀疑群众的倾向在当时并不为鲁迅所独有。当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广大的群众没有觉醒,资产阶级的药方纷至沓来,而革命又屡遭失败的时候,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表面上的成就,往往会回过头来转而怀疑到行施的对象。后来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当辛亥革命失败后,也有过“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的感叹;陈独秀更认为“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这和鲁迅所谓“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是一个

时期知识分子中间比较普遍存在的心理。不过李大钊很快就抛弃了自己的看法，站出来和陈独秀争辩，等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他更积极地从事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尽管由于条件的限制，开始时还不免兼容并包，时时流露出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乃至柏格逊的创造进化论等等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他由衷地歌颂十月革命，从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现实基础上进行介绍，他的基本论点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而且经过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钻研，这种倾向越来越鲜明，终于使他成为初期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怀疑思想却保持了较长的时期，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用进化论启发进取，用个性主义鼓吹反抗，从达尔文和尼采身上撷取了一些思想材料，按上新的解释而加以运用。当然，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尼采主义的本质是反动的，鲁迅当时还没有从这点上进行辨别的能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他把个性解放和进化观点当作社会斗争的武器，在实践中时时反射出浓厚的启蒙主义的色彩，这在当时，也还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五四的号角响了！鲁迅积极起来斗争。与进化论思想和个性主义观点同时存在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立刻更加鲜明地升到主导地位，使前者的消极因素受约束，被缩小。长期积累起来的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一时如火星迸发，照耀着战斗的最前哨。鲁迅的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不仅在小说里，而且在他当时所写的杂文里，有着更直接更鲜明的反映。

二

那么，鲁迅杂文是怎样来反映五四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精神的呢？

广泛的社会批评是鲁迅早期杂文一个显著的特色。鲁迅是非常重视社会批评的，他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而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他不但根据这点来办刊物，同时也根据这点来进行写作，鲁迅杂文所涉及的社会面之广，单就《新青年》上发表的

“随感录”而论,“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然而这些问题又统一于鲁迅所提出的一个强烈的要求:“撕去旧社会的假面”。无论从这个要求来说,或者从他所谈的内容来说,都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杂文的矛头,是对准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习的,他给这一切以毫不容情的打击。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人民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历史上改朝换代,十分频繁,但人民过的却始终不外乎两样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是乱世,兵燹灾害,杀戮殇亡,“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当然谈不到人的资格;等到所谓“太平盛世”,做是做稳了,但做的依然是奴隶,不是人。《左传》里不是有过规定吗?“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层层相压,一级制驭一级,简直像是一座镇魂摄魄的宝塔。被压在下层的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因为这就是由稳而不稳,由所谓“太平盛世”而乱世,于是乎又是兵燹灾害,又是杀戮殇亡,又是“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所以鲁迅给几千年来全部封建制度的历史作了一个这样的总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他又进一步提醒人们:“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然而事实又怎样呢?

虽然时间到了20世纪,充耳触目的却正是歌颂祖德,仰慕往古,读经尊孔,迎尸拜蛇,据乩坛而大谈科学,揭鬼话以自诩文明,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祖传老病”,一件件视同珙璧,这就不能不使现实主义者鲁迅戟指大叫:“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又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吧!想出世的,快出世吧!想上天的,快上天吧!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快离开吧!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鲁迅十分清楚：不管这些人挂什么招牌，用什么借口，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扼杀新的机运，抗拒一切足以促使民族进步和人民解放的潮流。即使满口维新，也不过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所谓君主立宪，所谓虚君共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以科学发扬精神文明，所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从矛盾的夹缝里探出头来的陈死人的说教。他们的满口“中庸”，是因为已经到了非“中庸”不可的时候。误信这种“让步”，误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其结果必然是“自家掘坑自家埋”。鲁迅指出：“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这正是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鲁迅思想上的深刻的体现。

鲁迅杂文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然而作为五四时代精神所系的几个突出的问题，鲁迅关注更切，因而在杂文里也往往再三论及。第一，所谓保存国粹问题。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发端于五四前夕，这是思想斗争的一个导火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守旧派之所以要借保存国粹的名义，维护文言，提倡国学，表面上为了形式，实质上却在于内容，也就是争取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继续盘踞统治的地位，以压制革命思想的兴起。鲁迅一开始就揭穿这个把戏，他说：“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于是他问：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意思当然是明白的，他们决非“光复旧物”的志士；辫子虽经剪掉，“血管里的昏乱分子”却还在“作怪”，抱着封建牌位向二十四史叫魂，目的是让宗法社会里的“无名肿毒”重新生到中国人的身上，“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一群遗老遗少又可以托庇寄生，混沌一世。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封建政体的骸骨已经腐烂，一切游魂落魄也就难于依附。鲁迅干脆地指出：首先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倘没有，那就可以证明，所谓国粹也者，其实不过是“孱主和孱奴的宝贝”，与广大的人民无关。第二，妇女与青年

问题。本来,“男尊女卑”和“长幼有序”是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特征,孔老夫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封建社会里有许多名教伦常,什么“三从四德”、“内言不出于阊”、“男女授受不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等,在束缚着妇女与孩子;历来的黑暗势力也总以迫害女性和压制青年作为礼与道德的标准。五四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运动,为了解放妇女,解放后一代,这两个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斗争的重要的内容。鲁迅沉痛地指出:“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封建制度把人分成十等,便是最末等的“台”,也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鲁迅通过这些深刻的分析,说明了中国妇女和青年的悲惨地位。其实不仅民国以前如此,当旧的社会基础没有动摇,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还没有肃清以前,这种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就在五四当时,不是还有人在排演“表彰节烈”的把戏吗?还有人认为娜拉虽然出走,最后只好仍旧回到家里吗?还有同是女性,当了校长,就把学生当作童养媳来虐待吗?还有人认为青年为国事请愿,遭到反动政府枪杀,是自蹈死地吗?还有许多“英雄”,在“专向孩子们瞪眼”吗?鲁迅向这些现象投掷了最大的憎恨,他反对“寡妇主义”、反对“坚壁清野主义”、反对“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的教育法;他为镇压着白蛇娘娘的雷峰塔的倒掉而欢欣鼓舞,为三一八惨案中“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而感奋赞叹。鲁迅主张做父亲的应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主张青年们积极起来反抗,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主张妇女争取经济权,并且站出来和男子一同奋斗,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一切在当时都起了积极的推动的作用,成为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第三,反虚伪问题。五四运动的主要精神是科学与民主,从现实主义者鲁迅看来,科学的最大的对头是虚伪,是“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段祺瑞滥借外债,断送国权,为了讨好日本,积极主张参战;等到大战结束,什么都没有到手,而他却还在大吹大擂,宣传其参战政策的“高明”;陈愿为了谄媚教育总长,袒护女师大校长压迫学生,诋女师大为“臭毛厕”,“人人得而扫之”,却又自诩为“执中”“公允”,大耍其“公理”的把戏。他们善于

变化,是羊,同时也是凶兽,“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他们毫无特操,“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鲁迅给这一类人起了个非常恰当的名字,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如果“做戏的虚无党”当了权,一天天阔起来,中国也会一天天“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至于等而下之,说什么“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说什么洋人专挖眼睛,挖去了可以做照相机,说什么“赤”“蚩”同音,所以赤化分子的始祖是蚩尤等等,那更是大大小小的骗局,其目的在于以鬼话代替科学,使社会充满妖气。鲁迅自说他的任务是“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但是,为了促使民族进步和人民解放,他还是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忠告:“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当然,一切黑暗和邪恶都有所附丽,鲁迅并不是泛泛地来论述这些问题的。鲁迅在左联时期打过三次大仗,其实五四当时,他也经历了三次并不算小的战役。他的思想威力和科学态度,他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的精神,通过这些具体的斗争,给青年们以无比深刻的教育。首先是对“学衡”之战,这一派提倡国学,“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然而恰如鲁迅所说,其实只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要想“衡”别人,而“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和是非。”鲁迅认为只要“估一估”,就可以把假古董的斤两估出来。他一共摘了六条,我这里只举一例:譬如《学衡》里有一首“渔丈人行”,开头两句是:“楚王无道杀伍奢,复巢之下无完家。”鲁迅说:“假如‘家’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不可的。”这真叫层层批驳,有口难辩,其它五条也闹了同样的笑话。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结果只暴露了自己的“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白白地出了一场丑。其次是对《甲寅》之战,《甲寅》的主持者是提倡读经、反对白话的章士钊,赫赫大家,这回该非假古董可比了。然而不然。鲁迅还是就其原文加以批驳,看来章士钊连《庄子》里“每下愈况”那样的成语,也用

不清楚；至于旁加密圈，自以为是佳句的——“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不过是套用何栻的烂调，文质二道，都显得一代不如一代。更有趣的是：章士钊把“梁父吟”里的“二桃杀三士”，本意用来代表勇士的“士”，错解为“读书人”，变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偶然弄错古典，原也算不了什么，不过章士钊是以此作为武器，来嘲笑白话文的不可行的，后面还俨乎其然地加上一句：“是亦不可以已乎？”章士钊的这个错误，恰恰反证了文言文的含糊，笼统，比不上白话的明白清楚。鲁迅说：“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在这两次战役里，以渊博的知识和科学的分析，发挥了高度的逻辑力量，恰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再其次是对《现代评论》之战，这一次鏖战激烈，所费的时间最长，所花的笔墨也最多。《现代评论》派里不但有陈愿，还有徐志摩，而且背后躲着一个胡适，这些欧化绅士们的出场，说明新文化内部已经在准备着一次分裂，资产阶级右翼决定向封建势力投降，从军阀统治的代表人段祺瑞一直到形形色色的卫道先生们，现在需要一些西洋国故来维持他们的门面，陈愿的“闲话”，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就其实质看来，完全符合于鲁迅的分析：“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住一批“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使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继续演出其僵尸的跳舞。当女师大案件发生，陈愿肩着“公理”的招牌开始抛头露面的时候，他所扮演的还不过是一个叭儿：“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等到三一八惨案发生，他的山羊似的性格便显现出来：“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用流言把群众引向屠场，而又口口声声说什么“执政府前原是‘死地’”。鲁迅说：“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然而这其实是无需惊心动魄的，五卅运动当时，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徐志摩已经说过：这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五卅运动以